

知識天地

數位化：史學與社會結合的一大契機

林滿紅研究員(近代史研究所)

1995年時，正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滿五十週年，臺灣的歷史學界曾先後舉辦兩次研討會，回顧五十年來臺灣歷史學的發展。一由東海大學歷史學系與《新史學》合辦，是就某些斷代史或專門史的研究進行評論；二由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辦，就五十年來史學各領域的研究成果進行量化統計分析。相對於這兩次史學回顧會議之著重對當代臺灣史學各個細部的了解，筆者曾於同年發表〈當代臺灣的史學與社會〉一文討論這兩者間的關係。在這篇文章中，筆者指出當前臺灣社會的很多問題，相當程度是來自歷史學與社會的嚴重脫節。在撰寫該文的十多年後，於2008至2010年時，筆者在借調國史館館長的2年7個月期間，卻深刻體認到：在歷史資料有了數位化支援之後，史學與社會可以有很多結合。筆者最近發表的〈數位化：史學與社會結合的一大契機〉一文以國史館在展覽、拍製歷史紀錄片、建構歷史資料庫及推進國史研究等方面的工作為例，說明數位化在結合歷史學與社會方面所發揮的作用。（註）在本院週報知識天地這個篇幅中，除將主要摘述這篇文章的內容之外，另將附帶提及本院研究與這項結合的關連，從而建議本院帶領各大學將研究成果考核對象加入數位加值產品，以協助數位人文社會的建構。

一、數位化對史學與社會結合可發揮的作用

(一)快速分享原來難以查找或散布世界各地的歷史證據

如2009年4月13日國史館推出的「蔣經國總統百歲誕辰展覽」，所以能夠在60個工作天之內由俄國取得經國先生在蘇聯期間的相關檔案，也是因為俄國已將該檔案數位化。透過展覽及其圖錄，使這段在冷戰時期外界較少機會得知的歷史，包括其加入共產黨的過程，分享國內外社會。2009年4月28日國史館推出的「臺北賓館展覽」，也因臺、日兩方有了數位化的《臺灣日日新報》、《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可以參考，才得以在約半年內，找到約七萬四千字的相關信息，以更完整地重建該建築在作為日本駐臺灣總督官邸時期的活動。這種報紙資料，在沒有數位化時期，筆者有過兩個月找到一筆500多字信息的經驗。歷史資料透過展覽的詮釋，可讓一般人更能感受歷史，如由末代朝鮮國王高宗之子曾住過此總督官邸，可以窺見同為日本殖民地的臺、朝之間可能有的往來。

(二)減少資料彙編的時間，並更有效地發揮該彙編結果

以往國史館同仁花費主要的時間進行資料彙編的工作，將外界不易查找的資料提供學界利用。在歷史資料可以數位化之後，根據後設資料，可更快速完成如美援、九年國教等等主題資料庫的建構。以往占極大存藏空間的資料彙編書籍，藉著數位化技術製作成電子書後，方便複製部分引文及協助直接作註。而國史館同仁在減少史料彙編的時間之後，也更有時間利用該等資料撰寫論文，在2008—2010年間，國史館發行的學術期刊出版期數倍增，館內同仁投稿率增加，也受數位化的影響。1993年因立法院「總統副總統文物法」的頒布，使國史館同仁整理並加以數位化的資料由平面的文獻擴大而包括立體的文物。這些文物包括世界各國送給我國元首的禮品。2010年10月10日「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館，展示此等文物可使國人拓展更多全球視野。如其中來自大洋洲的禮品很多草編的手工藝品，可與臺灣原住民的蘭草文化關連思考。

(三)促進提出歷史解釋

因為歷史資料難找，歷史學家傾向於從事描述性研究。有了數位化資料之後，可以提出較多歷史解釋。國史館2008年年底推出「由總督府到總統府」建築的故事部分，利用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數位化的總督府檔案，說明今天該建築中央塔樓設計並非來自比圖第一名設計師的設計，而是來自統治當局彰顯威儀的考量，即具歷史解釋成分。對於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以後的發展，學界常有去日本化的概括論斷。除了由2008年完成的「由總督府到總統府」的展覽可看出其間的延續性之外，國史館2010年底出版有關白團的歷史紀錄片更利用已數位化的館藏檔案，訴說了我國與日本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一段軍事合作史。在前侵華日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號召下，其屬下軍官接受中華民國政府聘用，組成體制外的軍事顧問團—白團，協助進行反攻大陸的作戰計畫。

(四)協助化解爭議

多年來困擾臺灣的法律定位問題，其實可透過195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在臺北賓館簽訂的臺北和約獲得釐清。

該條約全名為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和平條約。為免與197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友好和平條約混淆，參照以簽約地簡稱條約的國際慣例，簡稱臺北和約。此約更具體的簽約地點是位於外交部對面的臺北賓館。在國史館承辦展覽之際，除了筆者原透過近史所沈懷玉小姐由外交部拍攝的條約原本已有日本天皇的批准書之外，因為我方相關檔案已經數位化，很快找到我國行政院、立法院、行政院通過該約的文件及蔣中正總統的批准書，由日方數位資料庫也快速找到其國會通過的資料。由於聯合國只承認在該組織登記的條約，得到甯紀坤大使的協助，在聯合國已數位化檔案中也找到臺北和約登記為該組織1952年1858號條約。除展示這些文件之外，該展覽籌備過程更困難的是要將當年簽約者塑造雕像，以加深印象。由圖1的這張有很多人的照片轉為圖2在預算許可範圍內的五人雕像，需要大量的數位化檔案，去找出與該約簽訂最有關係的五位檯面上的人物；由圖1的平面照片轉為圖2的銅像，還要大量數位化的相關照片，去重構各位人物各個角度的身影及神情。

(五)提升當代史研究在歷史學中的學術地位

國史館在中國歷朝的核心職掌，並非歷代中國歷史的研究或前代歷史的研究，而為各朝當代史資料的管理與研究。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當代史資料未數位化之前，當代史研究因為以堅實證據提出較大解釋的作品較少，在歷史學界未能取得與早期歷史研究同等的學術地位。如今以國史館新設國史研究獎助的作品為例，因有數位化檔案可資利用，其學術水平有所增進。此外，因有數位化資料加強研究，以當代史研究取得歷史學碩、博士學位及大學教職的作品增加。根據本院許雪姬研究員的統計，2002年以來，從事當代研究的博碩士論文，在臺灣史研究中，為數已超過從事清治或日治研究的數量。目前在大學之中，以當代史研究擔任歷史系教職者約10人，這比十幾年以前之1、2人有所增加。

二、本院研究與數位加值成果

以上這些數位加值成果雖由總統府轄屬的另一單位—國史館推出，但其背後實有總統轄屬的這一單位—本院，長年研究的支撐。以蔣經國在蘇聯時期的展覽為例，本院近代史研究所余敏玲副研究員的相關研究是重要的基礎。而筆者於2008年5月20日宣誓就國史館館長職，5月23日即受命策劃總統府展覽，同年7月21日又受命為臺北賓館策展，這兩個展覽都涉及原本國史館並不熟悉的日本統治臺灣時期的歷史。能夠對當時史事與史料有若干掌握，要感謝本院東南亞、東北亞、亞太區域研究計畫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長年對筆者所進行日本統治時期臺商亞太商貿網絡研究所提供的背景。

至於「總統副總統文物館」之內，除了在總統外交職掌下產生的各國禮品，也展覽了中華民國總統制度建構的歷史過程。這要感謝本院近史所與蔣經國基金會曾支持筆者有關「中華民國經濟檔案」進行調查，其中曾探討型塑檔案的機關之職掌變化。2009年5月7日筆者出席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有關「數位典藏與學習」之相關會議，對於曾志朗院士在席中以文化政委身分，對相關成果有限感到憂心忡忡記憶猶新。數位加值成果因為可接近性及能見度高，引發爭議的可能性也較多，但也更能達成本院長年以來讓本院研究推向社會、推向國際的理想目標。本院目前的數位加值工作，固然有些有研究人員指導，但很多委由非研究人員負責。數位加值產品如能納入研究成果考核，由研究人員帶領，進行較具學術性的數位加值計畫，將可支援目前國家正切盼提升的文創產業。如由本院帶領大學都朝此方向調整，則國家長年在數位人文方面的努力將可得到更為豐碩的成果。

註：收入項潔主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年12月），頁45-69。



圖1



圖2